清史纂修（本栏目得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支持）

毛奇龄“出入”国史《儒林传》与清学史的再书写

赵迈禧

［摘要］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阮元一反时人的学术史观念，推崇毁誉参半的清初学者毛奇龄为经学开山。他在修纂国史《儒林传》时，透过书写毛氏传记，试图将这一认识转化为官方定论。尽管毛奇龄在后续国史纂修中被移出《儒林传》，但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其学术地位有所上升，部分学人承认了毛奇龄的经学成就。毛奇龄不仅被私撰的学术史著述接纳，更重新进入国史《儒林传》中。并非所有人都尊毛奇龄为“开山”，可官方国史中传记文本的改写与传主形象的成立，让学林无法忽视毛奇龄其人其学，这影响到后续清学史的书写。从毛奇龄进出《儒林传》的命运，可以测度一时学风的转变。

［关键词］ 毛奇龄　清代学术史　国史《儒林传》　阮元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5）－03－0163－012

自晚清民国以降，不断有学者去追寻清学兴起的缘由，构造出理路不一的清代学术史脉络，其中更有著作成为今天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典范。[①] 然而，清代学术与清代学术史是历史真相与历史认识的关系，透过清代学术史所见到的清代学术只是历史的一面而已，甚至有时候是被扭曲的一面，当中不乏现代学人对过往学术的想象。[②] 就研究清代学术而言，关键是如何剥离后人的层叠认识，理清不同“叙述”间的承袭关系，同时明晰差异何以形成。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学人的“本朝”意识在创造学术史论述的同时，也对清代学术的发展产生导向作用。研究清代学术史论述形成过程本身，就是在探寻清代学术丰富的内涵。清初著名学者毛奇龄（1623—1713）[③] 在清代学人眼中的不同形象，便是典型案例。

［收稿日期］ 2024-04-01

［作者简介］ 赵迈禧（1999—　），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mxzhao22@m.fudan.edu.cn

① 最常为学者引用的便是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② 罗志田指出，梁启超、钱穆两人的清学史著述偏向道咸新学。张循挑战了习以为常的汉宋框架。罗志田：《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5 期；张循：《清代汉、宋学关系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反思》，《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4 期；张循：《清代“汉宋之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兰州学刊》2016 年第 9 期。

③ 毛奇龄卒年有争议。近年胡春丽认为，其去世于康熙五十二年，即 1713 年。本文信从胡文考证。胡春丽：《毛奇龄年谱（下）》，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 8 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26 页。

毛奇龄是清初一位独特的学者，著述数量在同时代学者中可谓独占鳌头。代表了清朝鼎盛时期官方学术权威意见的《四库全书总目》称“奇龄著述之富，甲于近代”。① 有关毛奇龄与清代学术的关系，当代学者黄爱平便断定“在明末清初学风嬗变的过程中，毛奇龄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② 可毛奇龄身后声名的两极化极为明显：全祖望（1705—1755）批判他“得罪圣教”，《萧山毛检讨别传》于毛奇龄的“丑态劣行，不惜铺张数千言”③；阮元（1764—1849）却尊崇毛奇龄为汉学开山，在为毛奇龄全集撰序时公开宣称乾嘉考据学的兴盛“谓非检讨开始之功则不可”。④ 全祖望与阮元两位学术巨子作出的论断分量自然格外不同，《萧山毛检讨别传》的影响更为深远，早年梁启超便据此直斥毛奇龄为“学界蟊贼”。⑤ 毛奇龄毁誉参半的背后体现了不同学术史话语的竞争。⑥

阮元并不是无的放矢，事实上这篇序文连同本文将讨论的阮元《儒林传稿》，两者的书写构成了独特的清学史谱系：毛奇龄不仅是明末清初学术的代表人物之一，更是清代汉学的开山之人。⑦ 陈居渊便直接称，阮元推崇毛奇龄是乾嘉汉学典范的重塑。⑧ 而重塑汉学典范的过程，明显表现在毛奇龄传记的书写中。清朝国史、《清史列传》、《清史稿》中均有毛氏传记，本文尝试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国史馆与清史馆档案，通过分析清朝国史中毛奇龄传记文本的变迁，观察其学术地位的升降，探析清代学术与学术史间的互动。

一、筑“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中的毛奇龄传记

“全神堂”一语出自王汎森，⑨ 指阮元所作《儒林传稿》，以及由此基础而来的二卷本《国史儒林传》，当然也包括了《汉学师承记》《学案小识》等论及清代学者的学术史著作。这是一个贴切的比拟。谁的名字能够进入这些好似学者碑传集般的“学术史”著作，以及这些学者的排名顺序、文内具体评价，都反映了撰写、编辑时的世风与士人世界的舆论，同时也对学风思潮的发展推波助澜。不同学者的身后形象与评价，除了散见文集笔记中涉及其学术成就的只言片语，集中地体现在学者传记之中，特别是代表了官方意志的清朝国史《儒林传》。在清代中晚期，评论一位学者，除了征引《四库全书总目》，也会参考国史中的《儒林传》的内容，可见国史《儒林传》如何影响本朝学术的书写。比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朝野讨论顾炎武、黄宗羲、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 173《西河文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 年，第 1524 页。

② 黄爱平：《毛奇龄与明末清初学术》，《清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

③ 全祖望著，朱铸禹汇校集注：《鲒琦亭集外编》卷 12《萧山毛检讨别传》，《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991 页。全祖望撰写《萧山毛检讨别传》的缘由，见郑吉雄：《全祖望论毛奇龄》，《浙东学术研究》，台大出版中心，2017 年，第 215−247 页。

④ 阮元著，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二集卷 7《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中华书局，1993 年，第 543 页。

⑤ “其纯然为学界蟊贼，煽三百年来恶风，而流毒及于今日者，莫如徐乾学、汤斌、李光地、毛奇龄。”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139 页。

⑥ 於梅舫指出，阮元清代学术史认识受各方瞩目，也面临挑战，特别是江藩（1761—1831）与方东树（1772—1851）的态度，他又强调毛奇龄是一位阳明学者。於梅舫：《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於梅舫：《从王学护法到汉学开山——毛奇龄学说形象递变与近代学术演进》，《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 期。

⑦ 戚学民：《论阮元撰二卷本〈国史儒林传〉》，《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09 年第 1 期。戚学民研究《儒林传稿》的成果被整合为《阮元〈儒林传稿〉研究》，近年又将其研究清国史馆档案中《儒林传》《文苑传》的成果结集。本文撰写过程中多参考戚氏的研究思路。戚学民：《阮元〈儒林传稿〉研究》，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戚学民：《清史档案中的清代文史书写》，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 年。

⑧ 陈居渊：《毛奇龄与乾嘉经学典范的重塑》，《浙江学刊》2002 年第 3 期。张循对陈氏的说法有所质疑，参见张循：《“词章”与考证学——追溯清代考证学来源的一条线索》，《学术月刊》2016 年第 5 期。

⑨ 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9 本第 1 分，2008 年。后收入《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王夫之三人是否从祀孔庙，有官员提出从祀与否当以国史中《儒林传》的记载为依据。[①] 可国史中的《儒林传》毕竟是当时的学者所修，这些学者参与国史，不仅是彰显了本朝的学术与学者，更是在自我定位与再书写。清代学术的脉络与特色，如何在清人的文字书写中被建构起来，是研究清朝国史《儒林传》的价值所在。

清朝的国史馆负责修纂当朝的国史，国史中的儒林传记，是从嘉庆十四年以后阮元担任国史馆总纂才开始的。阮元所撰的《儒林传稿》中收入了毛奇龄的传记，然而他离开国史馆后，毛奇龄很快被移除出了清国史《儒林传》，改列《文苑传》。在嘉庆年间，毛奇龄进入《文苑传》意味着一种"降格"。[②] 由于《儒林传稿》的流通相对较少，更常被利用的阮元所撰毛奇龄传记，是来自其文集中所收录的《集传录存》。阮元之子阮常生（？—1833）说明了缘由：

> 馆中据此为底稿，略删数篇，其不删之人，于篇句中亦有所删。然不删者皆已定为《儒林传》，传为史馆文，即不得刊入私集。至于已删者，即非史文，不妨削去"儒林"之名而收入私集，故今检稿，集录为一篇，收入《揅经室续集》。[③]

《儒林传稿》中被删除的传记，被阮常生在编辑阮元文集时收入。不过阮元撰写的大部分传记还是被留在了国史之中，不能够被私人文集收录。道光以降，民间流传着一种两卷本《国史儒林传》，未题撰者，但书前有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让人容易将其与阮元的传稿联系起来。其中并没有毛奇龄的传记，而且《揅经室续集》所收录的其他传记也没有出现在其中，可见《国史儒林传》是阮元稿本的修改本而非原貌。[④]

此后清朝国史的修纂持续进行，在中华书局雇人从国史馆中陆续抄录所形成的《清史列传·儒林传》[⑤] 与民国之后才纂修完成的《清史稿·儒林传》中，毛奇龄的传记又赫然在列，可见史馆中人对毛奇龄的学术评价发生了转变：在国史《儒林传》之后的修纂中，毛奇龄重新被列入《儒林传》。

在分析传文之前，需要先略述清朝国史中的《儒林传》编纂过程，以先确定选取文本的形成背景。清朝国史中的《儒林传》一共经历八次纂修，第一次纂修的成果便是阮元所留下的《儒林传稿》，但是阮元所留下的传记稿本并未进呈到御前。他的稿本经过删改润色之后才被上呈，这是清国史《儒林传》的第二次纂修，而日后流传较广的两卷本《国史儒林传》则是第三次纂修的成果。第二、三次纂修所形成的《儒林传》所收录学者的传记文本，基本是在阮元稿本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有所删改增并。第四次纂修晚至光绪年间，主持者为缪荃孙。光绪二十九年第五次纂修出自陈伯陶之手，陈氏在国史中留下的《儒林传》稿本随同其他稿本成为《清史列传》的祖本。[⑥] 第六次纂修要等到民初清史馆的开设，主持《儒林传》纂修的仍是缪荃

---

① 段志强：《孔庙与宪政：政治视野中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事件》，《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 4 期。

② 清代学者汪中之子汪喜孙得知乃父被列入《文苑传》中，千方百计请求阮元将汪中改到《儒林传》中。王章涛：《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 年，第 561 页。

③ 阮元：《揅经室集》续二集卷 2《集传录存》，第 1048 页。

④ 戚学民：《论阮元撰二卷本〈国史儒林传〉》，《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09 年第 1 期；戚学民：《阮元〈儒林传稿〉研究》，第 245–278 页；黄圣修：《清两卷本〈国史儒林传〉考述——兼论道光二十四年以前〈儒林传〉稿本之变化》，《故宫学术季刊》第 29 卷第 4 期，2012 年。

⑤ 王锺翰认为大部分过录自《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清史列传》的毛奇龄传记并非过录自《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而与嘉业堂所抄写的《清国史·儒林传》传文一致。王锺翰：《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社会科学辑刊》1982 年第 3 期；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正文卷 119《词臣传》，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 148 册，明文书局，1985 年，第 535–538 页；《清国史》第 13 册，中华书局，1993 年，第 581–582 页。

⑥ 根据《文苑毛奇龄传》中所附陈伯陶的签条，可知毛奇龄被重新放入《儒林传》是其手笔。《文苑传》，《史馆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文所引档案，除另有注明外，均藏该馆），档案号：故传 004398。

孙，他将《儒林传》改成了《儒学传》。第七次纂修由马其昶主持，[①] 但《清史稿》付印时，却因丢失马其昶的稿本，纳入缪荃孙的《儒学传》并改名为《儒林传》，这就是所谓第八次纂修，即今日的《清史稿·儒林传》。[②] 结合清朝国史《儒林传》八次纂修的过程，其中的毛奇龄传记可以分为三个文本系统：①阮元所撰（第一次稿），②缪荃孙所撰（第四、六、八次稿），③陈伯陶等撰（第五次稿），实际上都可以溯源到阮元所撰写的毛奇龄传记。阮元的撰写方式是，"各儒传语，皆采之载籍，接续成文，双注各句之下，以记来历，不敢杜撰一字"，[③] 汇集了不同来源的史料撰写出传记，而在具体文本的呈现中以双行小注的方式标记出文本的史源，令读者得以追索所撰文字与所据来源间的出入。本文讨论清朝国史《儒林传》中毛奇龄传记间的差异，所依据版本分别来自阮元《揅经室集》、[④]《清史列传·儒林传》、《清史稿·儒林传》，同时利用档案勾勒定型文本间的改写痕迹。

二、开始之功：阮元《儒林传稿·毛奇龄传》重构学术史谱系

在讨论毛奇龄传记之前，需要先了解阮元对毛奇龄的基本态度。嘉庆元年（1796），阮元为陆成栋重刻《西河合集》作序，称"喜观是集，得力颇多。惟愿诸生共置案头读之，足胜名师十辈矣"。[⑤] 阮元于此事不无得意，"萧山毛西河、德清胡朏明书籍，予作序推重之，坊间多流传者"。[⑥] 此句出自《定香亭笔谈》，是书乃阮元督学、巡抚浙江时幕僚所录。《定香亭笔谈》付印时乃嘉庆五年，距离阮元作序才不过五年。[⑦] 光绪初年陈康祺（1840—1890）在记叙阮元推重经学时，所用事例便是为毛奇龄著作撰序，且在阮元自述前添上"初时鲜过问者"，[⑧] 以强调阮元的功劳。

除了作序推重毛奇龄文集，阮元对于毛奇龄学术地位上升的另一贡献，便是在纂修清朝国史《儒林传》时，不仅让毛奇龄厕身儒林，还将自己私人的学术立场"偷渡"到代表官方的《儒林传》中，表彰毛奇龄对清代经学的开始之功。

阮元的做法很快受到反弹，在他离开国史馆后，毛奇龄传记被移除出《儒林传》。到光绪年间毛奇龄的名声再度显扬，不仅重新回到《儒林传》，汉学开山的地位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除了毛奇龄长于引证，本就吻合乾嘉时的部分学风，毛奇龄文集的流通也使其影响力蔓延开来。由此看来，阮元为毛氏功臣的表现之一，正是他推动了《西河合集》的出版与阅读。当读者阅读《西河合集》时，很有可能会注意到阮元所撰写的序言：

> 议之者，以检讨好辨善詈，且以所引证索诸本书，间有不合也。余谓善论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长而正其误，若苛论之，虽《孟》《荀》无完书矣。有明三百年，以时文相尚，其弊庸陋谫僿，至有不能举经史名目者。国朝经学盛兴，检讨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

---

① 戚学民、阎昱昊：《余嘉锡覆辑清史〈儒林传〉》，《历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阎昱昊：《马其昶清史〈儒林传〉稿本初探》，《安徽史学》2022 年第 6 期；黄圣修：《清代学术的汉宋视角转换——以马其昶〈清史儒林传稿〉为中心的讨论》，《台大历史学报》第 70 期，2022 年。

② 戚学民：《汉学主流中的庄氏学术：试析〈清史稿·儒林传〉对常州学术的记载》，《中华文史论丛》2011 年第 4 期；马延炜：《清国史馆〈儒林传〉纂修活动考述》，《故宫学术季刊》第 25 卷第 3 期，2008 年。

③ 阮元：《揅经室集》续二集卷 2《拟儒林传稿凡例》，第 1023 页。

④ 又称《儒林传稿》，下面出于便利行文的考虑径直将阮元所撰毛奇龄传记称为《儒林传稿》。

⑤ 阮元：《揅经室集》二集卷 7《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第 544 页。

⑥ 阮元：《定香亭笔谈》卷 4，《续修四库全书》第 113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528 页。

⑦《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撰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505 页。

⑧ 陈康祺的说法有些不符合事实，阮葵生（1727—1789）已记载乾隆时人喜读毛奇龄文集。陈康祺撰，晋石点校：《郎潜纪闻二笔》卷 16，中华书局，1984 年，第 633 页；阮葵生：《茶余客话》卷 1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204 页。

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迄今学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书授徒之家数十，视检讨而精核者固多，谓非检讨开始之功则不可。……至于引证间有讹误，则以检讨强记博闻，不事翻检之故，恐后人欲订其误，毕生不能也。我朝开四库馆，凡检讨所著述，皆分隶各门，盖重之也。[①]

阮元还是提及了毛奇龄遭人非议之处，但认为应该“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长而正其误”，不能因为毛奇龄所引的证据与原书偶有不合，便否认他开启国朝经学的地位，并解释说这些错误是因为毛奇龄“强记博闻，不事翻检”。阮元此序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瑕不掩瑜的态度，还首次将毛奇龄视为清代经学的开始之人。到阮元纂修《儒林传》时，正式将这一私人意见放到了代表官方立场的国史之中。[②]

比对三种版本的毛奇龄传，可以看到《儒林传稿》《清史列传·儒林传》[③]在叙事结构上类似，而《清史稿·儒林传》则稍有不同。[④]叙事相同部分的文字三者出入不多，晚出的两种毛奇龄传在叙事上相对阮元的传稿更加丰富。唯独《清史稿》记载毛奇龄曾加入抗清军队，国史馆中的传记都避而不谈此事，可见“遗民”身份的敏感。

为了完整呈现阮元的毛奇龄传记书写，在此不惮烦琐，将其中涉及毛奇龄学术成就的叙事录出：

其言《易》，发明荀、虞、干侯诸家旁通卦、卦变卦综之法，①是后儒者多研究汉学，不敢以空言说经，实自奇龄始。而辨正图书，排击异学，尤有功于经义。(《提要》) 先是，奇龄官翰林时，康熙乙丑会试，为同考官，分阅《春秋》房卷，心非《胡传》之偏，有意撰述，(盛《传》) 至是，乃就经文起义，著《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春秋简书刊误》二卷、《春秋属辞比事记》四卷，条例明晰，考据亦多精核。(《提要》) 又欲全著《礼经》，以衰病不能，乃次第著昏丧祭礼、宗法庙制及郊社、禘祫、明堂、学校诸问答，多发先儒所未及。(盛《传》《经》《集》凡例) 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亦多所考证，而《大学证文》及《孝经问》，皆援据古本，②后儒改经之非，持论甚正。(《提要》) 奇龄之学，③淹贯群书，(《提要》) 所自负者在经学，数称东汉人行谊，谓足见人真性情。(《绍兴府志》) ④惟好为驳辨以求胜，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如《古文尚书》，自宋吴棫后多疑其伪，及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奇龄则力辨以为真，遂作《古文尚书冤词》，又删旧所作《尚书广听录》为五卷，以求胜于若璩，而《周礼》《仪礼》，奇龄则又以为战国之书。至所作《经问》，其中所排斥者，如钱丙、蔡氏之类，多隐其名，而指名攻驳者，惟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余子则不足齿录。其傲睨如此，(《提要》) ⑤故不得为醇儒。(沈德潜《别裁集》小传)……《四库全书》收奇龄所著书目多至四十余部。[⑤]

阮元在记叙毛奇龄生平时格外谨慎，对毛奇龄的学术评价也唯官方马首是瞻。当日最为权威的说法当然来自刊印不久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事实上阮元在传记的注释中七处标出《提要》，显示他写作的传记大多取自官方观点。阮元不敢在国史中私撰一字，但通过巧妙编辑不同来源的材料，使得原本有着各自语境脉络的文字汇集成毛奇龄传时，意涵居然大为改变。[⑥]现将上引传文中标明序号出处一一列出，见表 1。

---

① 阮元：《揅经室集》二集卷 7《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第 543 页。

② 此序可能是焦循代笔。《焦里堂先生轶文》，《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472 册，第 274–275 页。

③ 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卷 68《儒林传》，中华书局，1987 年，第 5456 页。

④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 48《儒林传》，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3175 页。

⑤ 阮元：《揅经室集》续二集卷 2《集传录存》，第 1025–1027 页；阮元：《儒林传稿》卷 2《毛奇龄传》，《续修四库全书》第 537 册，第 640–641 页。

⑥ 於梅舫：《汉学名义与惠栋学统——〈汉学师承记〉撰述旨趣再析》，桑兵、关晓红主编：《近代学术的清学纠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119–120 页。

表 1　阮元所撰传稿与其来源比对

序号	阮元毛奇龄传	来源
①	是后儒者多研究汉学，不敢以空言说经，实自奇龄始。	其间虽不免有强词漫衍、以博济辨之处，而自明以来申明汉儒之学，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说经，实奇龄开其先路。(《四库全书总目》卷 32《易小帖》提要，第 38 页。)
②	后儒改经之非，持论甚正。	奇龄此书负气叫嚣，诚不免失之过当。而意主谨守旧文，不欲启变乱古经之习，其持论则不能谓之不正也。(《四库全书总目》卷 32《孝经问》提要，第 266 页。)
③	淹贯群书，所自负者在经学，数称东汉人行谊，谓足见人真性情。	其学淹贯群书。(《四库全书总目》卷 12《古文尚书冤词》提要，第 102 页。) 其解经多与宋儒枘凿，平生持论，喜事功厌空谈，素称东汉人行谊，谓足见人真性情。(俞卿纂修：康熙《绍兴府志》卷 58《续人物二十一 · 毛奇龄传》,《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 年，第 4750 页。)
④	惟好为驳辨以求胜，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如《古文尚书》，自宋吴棫后多疑其伪，及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奇龄则力辨以为真，遂作《古文尚书冤词》，又删旧所作《尚书广听录》为五卷，以求胜于若璩，而《周礼》《仪礼》，奇龄则又以为战国之书。至所作《经问》，其中所排斥者，如钱丙、蔡氏之类，多隐其名，而指名攻驳者，惟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余子则不足齿录。其傲睨如此。	好为驳辨以求胜，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辞。故《仪礼》十七篇古无异议，惟章如愚《山堂考索》载乐史有五可疑之言，后儒亦无信之者。奇龄独拾其绪论，诋为战国之伪书。《古文尚书》自吴棫、朱子以来皆疑其伪，及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奇龄又力辨以为真。(《四库全书总目》卷 12《古文尚书冤词》提要，第 102 页。) 至其中所排斥者，如钱丙、蔡氏之类多隐其名，而指名而攻者，惟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余子则不足齿录。其傲睨可云已甚。(《四库全书总目》卷 33《经问》《经问补》提要，第 276 页。)
⑤	故不得为醇儒。	西河湛深经学，著述等身，在国朝可称多文为富者。惟攻击朱子，不遗余力，至镌书若干卷，以示旗鼓，所以不得为醇儒，艺林惜之。(沈德潜等：《清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 427 页。)

将阮元所连缀成文的各段史料还原到原本的语境，可知绝非都是在褒扬毛奇龄学术的正面评价。如“不得为醇儒”虽是贬语，从阮元行文来看是因为毛奇龄好辩求胜，但在沈德潜（1673—1769）的原文中，明明已说毛奇龄不得为“醇儒”是因为他“攻击朱子不遗余力”。阮元采用了沈德潜的断语，看似公正地指出毛奇龄为学有瑕疵的一面，其实抹去了原作者批判毛奇龄攻击朱子的本意。阮元深知毛奇龄攻朱，可非议圣人与经典，相较文人学者间的互相轻视，两种缺点孰轻孰重，显然是前者罪过更大。尽管攻击朱熹、怀疑经典者大有人在，但阮元要在代表官方的国史中表达自己有关本朝经学谱系的见解，毛奇龄的负面形象绝不能来自“非圣攻经”。

纵然阮元煞费苦心要为毛奇龄在国史《儒林传》中立传，还精心编辑四库馆臣的提要，让毛奇龄成为汉学开山这一独特的清代学术史认识获得官方权威的加持。这毕竟是阮元私人的学术立场，毛奇龄在大多数学人眼中不仅算不得汉学开山，连是否能厕身儒林也大成问题。毛奇龄传记的命运并不顺遂：

> 总裁戴文端公进呈时，出毛奇龄于《文苑》，去沈国模、谈泰、桂馥、钱澄之、方中通、朱鹤龄、臧庸、阎循观、汪绂、金榜、王鸣盛、丁杰、任大椿、孔广森、张惠言、孔兴燮等十七人。文达不以为然，而载被删诸人入《揅经堂文续集》。[①]

不仅毛奇龄被改列《文苑传》，还有十七人的传记被删除。上引阮常生所言“略删数篇，其不删之人，于篇句中亦有所删”，说明阮家已知悉稿本的结局。

① 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 · 乙丁稿》卷 3《国史儒林文苑两传始末》，文史哲出版社，1974 年，第 468 页。

阮元无力改变乾嘉时期士人对毛奇龄的恶感，年长他超过三十岁的翁方纲（1733—1818）就对毛奇龄不无讥讽。在曹振镛（1755—1835）询问如何继续纂修国史《儒林传》时，翁方纲说，“毛奇龄全书五百卷，开首一卷是《舜典补亡》，乃其最末一卷是卖唱之打花鼓儿曲”。①翁氏认为，毛奇龄若入儒林，朱彝尊不可不一起立传。后来，曹振镛接受了翁方纲的意见，毛奇龄被移出《儒林传》。正是乾隆时代的学人态度，让阮元的努力遇阻。②但阮元的努力并未停歇。毛奇龄只是被改入《文苑传》，传文仍在国史之中，若按阮常生“传为史馆文，即不得刊入私集”的标准，毛奇龄传记岂能同其他被删除的传文一道放在阮元别集中？可见此种安排并非无的放矢，毛奇龄学术定位对于阮元相当重要。在并非阮元稿本原貌的两卷本《国史儒林传》之外，仍有根据阮元稿本的传本在流通，而代表阮元真正清学认识的四卷本《儒林传稿》，“出现最初直接来自阮元本人的授意”。③透过私人文集与官私定位暧昧的《儒林传稿》，阮元的汉学谱系也产生了影响，最终渗透进一些重要的清学论述。

为毛奇龄在《儒林传》中立传的努力虽然以失败告终，阮元的地位与身份还是会影响到一部分士人对毛奇龄的观感。凌廷堪就曾对毛奇龄的学术不无微词，讥讽其“攻新安，但举贺凌台之绪语，皆入主出奴余习，未尝洞见学术之隐微也”，④以为毛氏力诋朱熹为门户之见。可当凌廷堪致信阮元时，其对毛奇龄的评价转趋正面，“萧山之书如医家之大黄，实有立起沉疴之效，为斯世不可无者”。此言常被研究毛奇龄学术的论文征引来揄扬毛氏经说，⑤但凌廷堪为什么会有如此转变呢？细究这封写给阮元的书信，通篇在讨论一个儒学史上的问题——“克己”如何解释。凌廷堪认同阮元的观点，以为不应如朱熹般解释“己”为私欲，“克己”是修身而非战胜私欲。此后阮元将毛奇龄批驳朱熹的《四书改错》出示给凌廷堪，后者才发现阮元是沿着毛奇龄的考证继续探讨。凌廷堪十分赞赏毛奇龄“独取”东汉经学家马融的训诂，力辟宋儒“谬说”。阮元透过宣扬毛奇龄经学观点与传播其著述的方式，让凌廷堪见识到了毛奇龄考证的独到之处。依据汉代经疏来反驳宋儒，正是乾嘉之学的特色。阮元让凌廷堪意识到清初的毛奇龄早有同样的治学思路，并非固守阳明学藩篱攻朱。⑥有如此灼见的毛奇龄当然是本朝经学的开山者，更何况此处不仅是以考证反驳宋儒解经，更否定了在此之后的宋儒义理。⑦

当然凌廷堪对毛奇龄学问的肯定也有其脉络可循，他曾承认毛奇龄“说经，廓除宋儒蒙晦，于圣门颇为有功，然间有矫枉过正、近于武断者”。⑧对于乾嘉诸老而言，毛奇龄毕竟是在经说上遍攻宋儒，为后日清学的新解释开辟道路，有功圣门的评价相当高，让后面的“矫枉过正、近于武断”批评的力度减轻。凌廷堪的观点几乎与阮元暗合，毛奇龄的经学著述正是要来“医治”宋明儒者的沉疴。凌廷堪在不同层次文本中的转变，让后世窥探到阮元在毛奇龄学术评价上对他人的影响力。

阮元、焦循、凌廷堪三人都可被归入所谓扬州学派，前两人更是这一学派的中坚。⑨毛奇龄

---

①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12《与曹中堂论儒林传目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第445页。

② 黄圣修认为，曹振镛修改《儒林传》是要压抑汉学以提升宋学。黄圣修：《清两卷本〈国史儒林传〉考述——兼论道光二十四年以前〈儒林传〉稿本之变化》，第236页。

③ 戚学民：《阮元〈儒林传稿〉研究》，第246–250页。

④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16《好恶说下》，王文锦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143页。

⑤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25《与阮中丞论克己书》，第235页。

⑥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16《论语礼后说》，第146–147页。

⑦ 阮元的经学有自己的义理观念，最关键的便是“仁”论，“克己复礼”的解释与此有关。参见林俞佑：《阮元经学的义理进路》，暨南国际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⑧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18《字谱即五声二变说上》，第161–162页。

⑨ 扬州学派的研究可参考刘建臻专书。此外钱穆认为阮元等人的阳明学立场与毛奇龄相通，钱基博（钱钟书代笔）则认为焦循等人推崇毛奇龄在于其使用了考据方法。刘建臻：《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钱穆：《国学概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册，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336–337页；钱基博：《序跋合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8–219页。

对于清代经学的突出贡献在于考证《易经》、讨论河图洛书始末，而焦循恰恰是《易》学专家，对于毛氏经说的价值体会更深。同时，阮元、焦循等人提倡会通，不满意乾隆时期汉学与宋学之间的学术壁垒。① 毛奇龄学问的特点便在于通博。② 成长于晚明的他身上带有浓厚的“博文”烙印，但是漫长的生命又使得毛奇龄在六十归家后仍有三十年时间致力群经，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才承认他著述“甲于近代”。无论是将本朝学术的典范替换为毛奇龄，还是将其加入学术偶像的行列，其目的都在于透过新学术典范的形成来提倡一种新学风。不管阮元等人是否因为推崇阳明学而将毛奇龄视为经学开山之人，后者以考证学方法阐发义理的思路得到了前者的认可。一味强调阳明学义理立场，容易忘却尊毛奇龄者更多视其为经学家这一事实，且晚年毛奇龄在康熙朝学风的影响下也以经师自命。

三、国史馆、清史馆对毛奇龄传文的改写与继承

《儒林传》后续主持者如缪荃孙、陈伯陶等人同样有自己的学术宗主与门户之见，于是后出两种传记如何定位毛奇龄的学术也大有深意。先来看《清史列传》如何叙述毛氏的学术：

> 自后儒者多研究汉学，不敢以空言说经，实自奇龄始。而辨正图书，排击异学，尤有功于经义……条例明晰，考据精核……多发先儒所未及……援据古今，辨后儒改经之非，持论亦有可采。奇龄淹贯群书，诗文皆推倒一世，而自负者在经学……著述之富，甲于近代。李天馥尝谓：“奇龄有不可及者三：不挟书册而下笔有千万卷，一也；少小避人，盛年在道路，得怔忪疾，遇疾发，求文者在门，扪腹四应，顷刻付去无误，二也；读书务精核，群经诸子及诸琐屑事，皆极其根柢，而贯其枝叶，偶一论及，辄能使汉宋儒者拄口不敢辨，三也。”然奇龄恃其纵横博辨，肆为排击，欲以劫服一世，汉以后人俱不得免，而其所最诋者为宋人，宋人之中所最诋者为朱子。故后人反诋之者亦多。全祖望尝发其集为《萧山毛氏纠谬》十卷。祖望称“奇龄之才要非流辈所易及，使其平心易气以立言，其足以羽翼儒苑无疑”。世谓公论云。③

《清史列传·毛奇龄传》几乎是照抄阮元所撰的毛奇龄传稿，如最为关键的“自后儒者多研究汉学，不敢以空言说经，实自奇龄始”。当然个别字眼有润饰，也删去几句，如“数称东汉人行谊，谓足见人真性情”；又在“淹贯群书”后增添“诗文皆推倒一世”。查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稿本，可以更清晰看到修改的痕迹，因为陈伯陶留下了带有自己署名的签条。他在签条中指出，“全传不及诗文之工”，于是增加此一语。④ 用本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著述之富，甲于近代”替换“《四库全书》收奇龄所著书目多至四十余部”。前面一部分几乎就是阮元的手笔，特别是继承了点名毛奇龄为汉学开山之人的那句话：“实自奇龄始。”

最大的变动是在传文最末增添了两段材料和一段议论，李天馥的评价颇为突兀，其实这是陈伯陶要为毛奇龄再度进入《儒林传》“辩护”：“毛大可不入儒林，前辈大有深意。增此一段，似较明显。”⑤ 签条的存在让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为何《清史列传》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文本状态。可注意的是传文批评毛奇龄“恃其纵横博辨，肆为排击”，指明他“最诋者为宋人，宋人之中所最诋者为朱子”的事实，以至于后来的学者也反过来攻击毛奇龄。可见陈伯陶不再为毛奇龄隐

---

① 冯乾：《清代扬州学派简论》,《史林》2005 年第 3 期。

② 在凌廷堪眼中，顾炎武和毛奇龄是他所处的学术世界中被认为读书广博的两位学者。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 16《好恶说下》，第 143 页。

③《清史列传》卷 68《儒林传》，第 5456–5457 页。

④《史馆档》,《文苑传》，档案号：故传 004398。

⑤《史馆档》,《文苑传》，档案号：故传 004398。另外有一种《毛奇龄传》的稿本，已经将陈伯陶的意见落实，全文与后来的《清史列传·儒林传》一致，最末记载“毛奇龄旧传入《文苑》，今改入《儒林传》下卷”。《史馆档》,《儒林毛奇龄传》，档案号：故传 005282。

晦其攻击朱子的行为。不过在晚清，汉学、宋学的门户已成，汉学家“反宋学”已成一种刻板印象，况且学林的风气早已变化得翻天覆地，距离文网尚紧的嘉庆年间已近百年，清末国史馆中的学者不必也不用为毛奇龄“遮掩”什么，这也是时代风气转移下学术思想变迁的一角。

馆臣在指明毛奇龄专攻朱熹之后，记载了全祖望曾经根据毛奇龄文集中的失误写成《萧山毛氏纠谬》，再引用了全氏“平心易气”便“足以羽翼儒苑”这段评价，而且说这是得到大家认可的公论。全祖望的这句话来自著名的《萧山毛检讨别传》，后世清学史论著讨论毛奇龄时几乎都会引用此篇文章，也正是此篇不符合传记体裁的别传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毛奇龄在士人中形象的一落千丈。正如本文初始所言，全祖望几乎都在攻击毛奇龄的品德与学术缺陷，传文却只截取了文章最后面表示惋惜的话。作者并非要借全祖望的记载攻击毛奇龄，反而是让读者见到极度厌恶毛奇龄的全祖望，亦有惋惜毛氏才华的心平气和之语。考虑到主持纂修的陈伯陶师从晚清广东学者陈澧，而东塾学派最为重要的主张之一便是调和汉宋，不攻朱子则“羽翼儒苑”或许代表了一种清学观念：汉学家毛奇龄若不是一直与朱熹的学说纠缠，地位不止如此。

能够继续留在国史列传行列，且从《文苑传》被放回地位更高的《儒林传》，可见晚清毛奇龄的形象较诸阮元的时代有所提升，他的学术足以自立于清代儒林之中。最重要的，还是文本中仍强调其开始之功。本来阮元视毛奇龄为本朝经学开山的清学认知是极为独特的，纂修者完全可以像当初将毛奇龄排除出国史《儒林传》一样，将“自奇龄始”摒弃于地位崇高的国史传文之外。这句话绝非毫不起眼，在毛奇龄传记之中可有可无，因为二十余年后便有人做出了修改。清代国史第五次纂修自 1902 年开始，通观其中的毛奇龄传记可以发现，原本是阮元孤见的观点被重新拾起，成长于道咸同光时代的士人不再像乾嘉诸老般鄙夷毛奇龄的为人与学术成就。

接下来看最后一次纂修成果《清史稿·儒林传》。《清史稿》本来是为前朝所撰写的“正史”，却命运多舛，最终付印时极为仓促，后世争议亦多。但《清史稿》中的《毛奇龄传》终究是在清朝国史的纂修谱系中运行，其主要作者缪荃孙还主持了第四次、第六次《儒林传》的纂修。《清史稿·毛奇龄传》如此叙述其学术成就：

> 条例明晰，考据精核……多发先儒所未及……援据古今，辨后儒改经之非，持论甚正。奇龄淹贯群书，所自负者在经学，然好为驳辨……《四库全书》收奇龄所著书目多至四十余部。奇龄辨正图、书，排击异学，尤有功于经义。①

《清史稿·毛奇龄传》中叙述传主学术成就的部分，乍看之下很难发觉同《儒林传稿》《清史列传》的差别，唯一明显的就是删除了《清史列传》最后增添的李天馥、全祖望评价毛奇龄的两段材料与最诋朱子的评价。毕竟这一段文字篇幅不短，马上就能看出被删除掉。从传文沿袭上来看，对前面两种清国史《儒林传》都有继承。一些细枝末节上可以明显看出文本的延续，大部分是同《清史列传》的用字相同，如“奇龄分校会闱”“温谕奖劳”“直史馆”等，但也有极少数如“考据精核”是采用了阮元的遣词造句，“《四库全书》收奇龄所著书目多至四十余部”也是阮元的说法。在评价毛奇龄的学术时，亦延续了《儒林传稿》的观点。

但《清史稿·儒林传》有一处决定毛奇龄形象走向的修改，至为关键的那句——“自后儒者多研究汉学，不敢以空言说经，实自奇龄始”——被删除了。这是《儒林传稿》《清史列传·儒林传》中违背《四库全书总目》原本意涵，特地用来点明毛奇龄为汉学开山者的文字。在《清史稿·儒林传》几乎完全继承前人传文的情况下，这处删减显得不起眼，却也意味着作者此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清史馆留下的《儒学传》底稿，显示这句话确实被特意标上删除符号。②

---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 481《儒林传》，第 13175–13176 页。

② 《史馆档》，《儒学传》卷 2《毛奇龄传》，档案号：故传 007478。

“汉学开山”这个评价被否定，纂修者并不赞同阮元的清代学术史谱系，同时这段文字后面的“辨正图书，排击异学，尤有功于经义”这句话被移到整篇传记的最末尾，显得十分突兀。显然撰写这篇毛奇龄传记的缪荃孙丝毫不赞同阮元推崇毛奇龄为汉学开山的见解。“来自常州的缪荃孙学术是江藩再传弟子，有牢固的（江淮学人的）汉学信念”,[①] 而《汉学师承记》中根本没有毛奇龄这位经学大师的位置。另外在民国时期，汉学已经成为反宋学的代名词，如果毛奇龄专诋朱子，那么他身上的汉学色彩无疑最为浓厚，这是缪荃孙无法接受的，于是被《清史列传》增添的“其所最诋者为宋人，宋人之中所最诋者为朱子”也同样被缪荃孙删除。他采取了和阮元类似的做法，意图却南辕北辙。不同于坚守宋学立场者将毛奇龄纳入汉学谱系的做法，缪荃孙的汉学史里面没有毛奇龄的一席之地。从此，清史《儒林传》中的毛奇龄形象再度发生变化。其实缪荃孙的底稿甚至把全祖望纠谬毛奇龄错误的意见当作注释列出，还一度打算把注文改写为正文，彻底在传记文本中批判毛氏学术，[②] 而第八次纂修稿的底本也还保持着全祖望的评价，[③] 只是最终的文本面貌并未实践其设想。

不过清朝国史《儒林传》这座“全神堂”的光彩不再，因为不再代表官方权威。《清史稿》付印时，连取代清王朝的北洋政府也是日薄西山，明明以前朝正史自居，也只能“无奈”谦虚，自称为“稿”。《清史稿·儒林传》虽然继承了前面清代国史写作留下的文本，却只是众多“全神堂”中的一间，更何况已经丧失掉国史的权威，变成清代学术史研究中相对还算重要的一种史料依据。此时的中国学术已行至近代，缪荃孙等人的观点当然可以算是众声喧哗的近代学术一部，却是被遮蔽的低音。毛奇龄的学术形象，不再由传记呈现，替代者是条例系统、更符合“现代”的清学史论著。国史被降格为史料的一种。

四、至今犹声光赫耀：毛奇龄传记书写余论

在国史《儒林传》还有着夺目光彩时，毛奇龄在一般士人心目中的地位相比此前的狼藉，多少会有所改善，尤其是阮元等大学者的宣传与《儒林传稿》的刊刻流传同时作用在一起。阮元的清学史谱系借助官方权威不断拓展影响力，之前的反对者也不得不予以回应，特别是私人纂修的“学术史”。影响深远的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与唐鉴（1778—1861）一秉程朱理学立场写作的《学案小识》，都对毛奇龄“视而不见”。方东树的《汉学商兑》逆势批判如日中天的汉儒经学，首攻毛奇龄，当然将在士人间声名不佳的毛奇龄算作汉学开山者，一定程度上是有着打击汉学声望的企图。[④] 在上述三种立场鲜明的著作之外，钱林（1762—1825）的《文献征存录》[⑤] 和李元度（1821—1887）的《国朝先正事略》[⑥] 都收录了毛奇龄的传记。这两种书对于清学史的书写，都直接受到了阮元的影响。尽管相比江藩、唐鉴、方东树专论清学的著作，《文献征存录》《国朝先正事略》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影响力有所不及，毕竟也是代表了一种声音，况且二书也并非毫无影响。[⑦] 作为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经常利用的史料之一，《国朝先正事略》甚

---

① 戚学民：《论清史〈儒林传〉对陈澧学术的记载》，《广东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 期。

② 《史馆档》，《儒学传》卷 2《毛奇龄传》，档案号：故传 007478。

③ 《史馆档》，《儒林传》卷 2《毛奇龄传》，档案号：故传 007848。

④ 朱维铮：《汉学与反汉学——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30 页。

⑤ 钱林：《文献征存录》卷 1《毛奇龄传》，《续修四库全书》第 540 册，第 18 页。

⑥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 32《毛西河先生事略》，易孟醇编纂，岳麓书社，2008 年，第 1001 页。

⑦ 在近代学术史影响极大的《书目答问》中就著录了《文献征存录》。张之洞著，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118-119 页。柴德赓在《清代学术史讲义》（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85 页）中论及毛奇龄，特地指明他在《国朝先正事略》中有传记。

至接受了阮元独特的清代学术史谱系，“专宗汉学以抵程朱之隙者，毛西河、惠定宇、戴东原诸先生也”。[1] 在此书编纂的年代，也只有阮元、凌廷堪等人会有这样的看法，将声名狼藉的毛奇龄和被清儒视为汉学泰斗的惠栋、戴震相提并论。

从嘉庆到咸丰，三四十年的时间没有使毛奇龄有功经义的评价销声匿迹，反而是接受这一清学史认识的士人数量在增多。在《文献征存录》刊刻出版数年之后，编撰《国朝先正事略》的李元度也必须正视毛奇龄的地位。身为唐鉴、曾国藩后学的李元度尽管立场兼采汉宋而偏向宋学，却不可能像湖湘学林先贤唐鉴一样直接将毛奇龄排除在学术史之外。钱林、李元度是有一定声望的士人，也许他们的认识稍微超前于同时代的一般读书人。不过普通的读书人也更易受到头顶官方光环的《四库全书》及提要、《儒林传稿》的影响，阮元作为学林领袖的推崇也有着不可低估的效用。当时间来到 19 世纪 60 年代，毛奇龄的学术地位与半世纪前阮元纂修《儒林传》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戴望（1837—1873）是生活在道咸同时代的晚清著名学者，他曾有一段涉及毛奇龄形象的文字：

> 徐处士初民，尝论近代经学之盛，萧山毛氏实启其端，比于后来，若陈涉之开汉高。识者皆韪其言。[2]

徐初民这类“处士”的评价应当可以代表来自一般读书人的声音，“识者皆韪其言”也可见毛奇龄开启本朝经学这一观点在一些士人群体中的流行。在晚清，全祖望《萧山毛检讨别传》中的批评、《古文尚书》真伪公案中毛奇龄的错误观点，都有学者作出了有利毛奇龄的辩护。李慈铭（1830—1894）便反驳了全祖望：

> 西河固非醇儒，而谢山骂之不遗余力，至讦发其阴私，亦几为市井无赖之叫嚣矣，所云“先赠公”者，乃谢山之祖父，一村老农耳，何由而知西河学问之底蕴，其言岂可据……其经学文章，不特吾郡之冠，亦天下之杰矣。善乎阮文达之序《西河全集》。[3]

李慈铭直接否定了全祖望立论的依据，认为其祖父不过是一个乡野村夫，没有资格评断毛奇龄的学术成就，强调最重要的还是毛奇龄的经说。而阮元的清学史书写正是李慈铭肯定毛奇龄的依据。

另外一位肯定毛奇龄的学者是皮锡瑞（1850—1908），他在《经学历史》中回顾清代经学兴盛的原因时叙述道：

> 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挽回风气，幡然一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皆负绝人之姿，为举世不为之学。于是毛奇龄、阎若璩等接踵继起，考订校勘，愈推愈密。斯为近因。[4]

毛奇龄在清代考证学兴起的过程中，是接续王、顾、黄清初三大儒的重要人物，甚至排名还在阎若璩之前。

尽管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厌恶毛奇龄人品与学问，使阮元等人的推崇显得突兀，但最终阮元以一代儒林祭酒的身份推动了毛奇龄形象的重塑，使得其学术地位呈现上升的趋势。随着《儒林传稿》的出现，阮元的论敌在“首攻毛奇龄”以回应其清学认识的同时，无意中为毛奇龄地位的抬升添了一把柴火。直至光绪年间清廷续修国史《儒林传》时，在京的士人陈康祺就说毛奇龄“著述百卷，多为秘府所收罗，至今犹声光赫耀”。[5] 光绪年间的清代学术史书写者，无论如何也不能轻视毛奇龄了。

---

① 李元度：《凡例》，《国朝先正事略》，第 6 页。

② 戴望：《谪麐堂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732 册，第 801 页。

③ 李慈铭著，王利器纂辑：《书〈萧山毛检别传〉后》，《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383–384 页。

④ 皮锡瑞撰，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99 页。

⑤ 陈康祺著，褚家伟、张文玲点校：《郎潜纪闻四笔》卷 11，中华书局，1990 年，第 184 页。

References

Huang Aiping. "Maoqiling yu mingmo Qingchu xueshu" (Mao Qiling and scholarship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Qingsh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4 (1996).

Liang Qichao. *Lun zhongguo xueshu sixiang bianqian zhi dashi* (On the great changes in Chinese academic and ideological trends).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9.

Luo Zhitian. "Daoxian 'xinxue' yu qingdai xueshushi yanjiu: lun zhongguo jin sanbai nian xueshushi daodu" ("New Learning" in Daoguang and Xianfeng period and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learning in the Qing dynasty: an introduction to on china's history of learning in recent 300 years). *Sichu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ban*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 (2006).

Qi Xueming, Yan Yuhao. "Yu Jiaxi fuji Qing shi 'Rulin Zhuan'" (Yu Jiaxi's edited version of *Biographies of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Lishi Yanjiu* (Historical Research) 2 (2017).

Qi Xueming. *Qingshi dangan zhong de Qingdai wenshi xieshu* (The writing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Qing historical archives). Beijing: Qinghua daxue chubanshe, 2022.

Qian Mu. *Guoxue gailun*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lassics). Taipei: Lianjing chuban gongsi, 1998.

Wang Fansen. *Quanli de maoxiguan zuoyong: Qingdai de sixiang, xueshu yu xintai* (The capillary action of power: thoughts, scholarship, and mentality in the Qing dynasty). Taipei: Lianjing chuban shiye gufen youxian gongsi, 2013.

Yu Meifang. *Xuehaitang yu hansongxue zhi zheyue dibian* (The Xuehai Academy and the debate on the studies of the Han School and the Song Schcool: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debate and its reflections).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16.

Mao Qiling's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from the *Biographies of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Qing History and the Rewriting of Qing Scholarly History

ZHAO Maixi (Institute of Advanced Humanities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mxzhao22@m.fudan.edu.cn)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s Jiaqing and Daoguang in the Qing Dynasty, Ruan Yuan, in contrast to the prevailing academic views of his time, praised Mao Qiling, a controversial early Qing scholar, as a pioneer in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When compiling the Biographies of Confucian Scholars for the official history, Ruan attempted to transform this recognition into an official verdict by writing Mao's biography. Although Mao's biography was later removed from the *Biographies of Confucian Scholars* in subsequent revisions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his academic status rose due to various factors, and some scholars acknowledged his achievements in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Mao was not only accepted into privately written academic histories but also re-included in the *Biographies of Confucian Scholars*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While not everyone respected Mao as a "pioneer," the rewriting of the biographical texts in the official national histor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ubject's image made it impossible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ignore Mao and his scholarship, which influenced the subsequent writing of Qing scholarly history. The fate of Mao Qiling's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from the *Biographies of Confucian Scholars* reflects changes in academic trends at that time.

Keywords: Mao Qiling, Qing Dynasty academic history, *Biographies of Confucia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Ruan Yuan